



马克思主义 人 类 学



黄凤炎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人类学

黄凤炎 著

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

登录号 833997

书号 C912.4
H32 5



00162748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01号

马克思主义人类学

黄凤炎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邮编430022)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1/32 印张: 10.25

字数: 254千 插页: 1 印数: 1--1 000

1993年2月第1版 1993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7-313-00996-7/C·73 定价: 4.85元

序 言

我首先要向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先生表示敬意。没有他的艰苦努力——整理和出版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我想系统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类学思想，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很遗憾，我不能赞成克拉德先生把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人类学化的观点和倾向，因为这不是事实。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之一，但绝不是它的整体。关于这一点，我将在拙著中进行深入的探讨和详细的论证。

如果以上观点成立，那么，长期忽视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的倾向就应该予以纠正了。根据我的研究，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应该是马克思整个思想发展进程的最新阶段，也应该是马克思人类学思想发展的最新阶段。撇开《人类学笔记》来谈论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将是不可能的。

如果这个观点也能成立，那么，在人类学界占主导地位的、把《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视为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唯一代表的观点也应该改变了。马克思在晚年《人类学笔记》中写有重要批注480多条，恩格斯在《起源》中仅仅使用了13条。这表明，《起源》远远没有囊括《笔记》中的丰富思想。用恩格斯自己的话说，它只是“稍稍补偿”了亡友的遗愿。

马克思的遗愿是什么？现在看来也值得推敲。恩格斯说过，马克思曾打算联系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来阐述摩尔根研究成果的全部意义。这显然不是马克思宏伟计划的全部。我们在马克思给

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恩格斯一次也没有提到这封信及其草稿,而它们却是马克思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中看到了这样一段话:“各种原始公社(把所有的原始公社混为一谈是错误的;正像地质的形成一样,在这些历史的形成中,有一系列原生的、次生的、再次生的等等类型)的解体的历史,还有待于撰述。到现在为止,我们只有一些粗糙的描绘。”^①从这段话中,不难发现马克思的遗愿究竟是什么?他“有待于撰述”的、并且已经作了一些“粗糙的描绘”的究竟是什么?这似乎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研究的对象。

马克思晚年通过人类学研究所提出的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新概念,与他1859年关于人类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迭的提法有何异同,显然不可回避。马克思在考察原生的社会形态时,不再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原始生产方式,而把它放到了从原生形态向次生形态过渡的位置上。马克思在考察次生社会形态时,把社会的发展划分为两大系列。一是阶级社会的发展系列:“不言而喻,次生的形态包括建立在奴隶制上和农奴制上的一系列社会。”^②一是各种原始公社变体的发展系列,如家庭公社、农村公社等等。这是一个崭新的观点,显然是对1859年提法的重大修正和补充。

必须承认,在农村公社特别是俄国农村公社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存在着重大的意见分歧。怎样看待这些分歧,也是不可回避的。这里关系到如何正确地把握马克思的总体方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其它方法,否则,就会陷入“对立论”的泥潭。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总体。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马克思晚期的人类学思想,是他早期和中期人类学思想的继续、反思、补充和发展。如果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孤立地看待马克思晚年的《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2页。

② 同上书,第450页。

类学笔记》，那就不可能得到关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完整概念。

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与其他人类学完全不同。它不仅以一与多、普遍与特殊相统一的观点深刻地阐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规律，而且用革命与进化、跨越与非跨越的辩证法科学地揭示了变革现存世界的多种途径和通向未来社会的总趋势；而其他人类学则往往满足于用不同的方式解释各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这就是说，两者的意义不可同日而语。

尽管如此，但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不是一本专著，也不是几篇论文，甚至连手稿或草稿都算不上，它毕竟只是由一些摘录、批注和只有马克思自己才能明白的各种符号组成的；而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人类学论述又大量地散见于其他著作、手稿和书信之中，几乎涉及《全集》的每一卷；况且，这里既无先例可循，又会遇到各种争论。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要建构一门独立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将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著名翻译家、《笔记》的中译本主持人徐若木先生对我说，这些笔记包含着极其丰富、博大的思想，值得我们一辈子去发掘、探讨和研究。他的这些话，这种为科学而献身的精神，时时都在激励着我，鞭策着我去探索 and 追求，去战胜各种困难。

困难倒没有什么，问题在于是否存在一门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自从1986年我从徐崇温先生那里接受“研究马克思晚年笔记”的课题以来，五年已经过去。这期间，我不敢有丝毫懈怠，一直在探讨和论证这一关键问题。我抱定“不怕失败、试一试”的信念，决定把我几年来的研究成果整理成册，奉献给读者。如果它到处都可能受到批评，那么，本书所追求的引起进一步探讨的目标也就达到了。

作 者

1991年4月于北京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导 论	1
一 二难选择	1
二 晚年疑点	5
三 三大误说	10
四 第四主题	15
五 总体方法	25
六 寻求内涵	32
第二章 历史前提	47
一 混沌的源头	47
二 伊甸园的人之初	51
三 从天国到尘世	55
四 从彼岸到此岸	63
五 进化论时代	69
第三章 人和社会一般	78
一 现实的人	76
二 人化自然	92
三 历史的人	122
四 人的本质	130
第四章 亚细亚寻根	145
一 历史寻根记由	146

二 印度共同体	156
三 亚细亚生产方式	172
第五章 社会原生形态	192
一 人类学背景	192
二 氏族社会理论	207
三 两种生产理论	221
四 社会进化理论	231
第六章 社会次生形态	243
一 农村公社理论	243
二 公社二重性理论	256
三 比较与证明	269
第七章 社会未来形态	291
一 跨越卡夫丁峡谷	291
二 社会发展大趋势	305
跋	316

第一章 导 论

费尔巴哈所没有走的一步，终究是有人要走的。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须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①。

一 二难选择

我们不能、也不可能撇开下述长期困扰人们的客观事实去讨论建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之类的各种问题：

马克思并不是本来意义上的人类学家。他在自己的全部理论遗产中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专门的人类学著作。虽说他对人类学的兴趣在他整个一生中都以不同的方式持续着，但似乎没有迹象表明，他的长期而多方面的努力是矢志一门与其他人类学相区别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建设。

同时，我们谁也不能否认，马克思毕生的理论活动与人类学传统及其发展形态有着不可分割的思想渊源联系。早在大学时代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34页。

他就接受过康德、黑格尔哲学人类学思想的正规训练。后来，他又受到费尔巴哈哲学人本学的强烈影响，甚至一度把它作为向一切旧传统挑战的强有力的思想工具。在创立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时，他一刻也没有忽视过从人类学的经验材料中吸取有益的思想营养。《资本论》第1卷问世以后，他几乎把全部精力都用于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的研究，而作为他当时最主要任务的《资本论》第2、3卷的写作、修订和出版则被降到了第二的或次要的地位。

面对这两方面可以引出多种结论甚至完全相反结论的历史事实，要在现代条件下以马克思的名义建构一门独立的全新意义的“人类学”是可能的吗？

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前提问题。它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非此即彼的二难选择。无论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同样都会遇到一系列难题。前者必须首先解决名与实相统一的问题，即这种人类学必须是马克思的或者起码是以马克思为根据的，而不是徒有马克思的空名，更不是随意强加的。后者则必须对马克思与人类学传统的渊源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客观后果作出总体的合乎逻辑的解释。

根据第一方面的事实，建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尝试是徒劳的。在马克思的著作、手稿、笔记和书信里，不可能找到马克思本人有过建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意向，马克思尚且有所不为，别人又何以为之？如果一定要把马克思研究和用过的人类学资料当作马克思主义人类学，那么，又当如何避免“强加”之嫌呢？

根据第二方面的事实，建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是完全可能的。从客观效果上看，外在的经过改造的人类学因素实际上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内部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谁也无法将它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大厦中排除出去。如果列宁能亲自看到并研究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也许他就会说马克思主义有四个来源和四个组成部分。马克思是否有建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动

机，不在于他是否说过诸如此类的话，而在于他实际上是否在这个方向探索。按照马克思的著述建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完成他由于过早谢世而未竟的事业，不过是恢复马克思本来具有的完整形象，这里不存在所谓“强加”的问题。

“否定论”争辩道，人类学因素加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并不能说明它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独立的组成部分。马克思大量使用人类学材料，一方面在于为《资本论》的研究和写作服务，系统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另一方面则在于补充和发展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两点恩格斯都作过明确的说明，而且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作出了全面的发挥，人们显然不能忽视这种最基本的客观事实。西方一些学者把恩格斯的《起源》当作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奠基作，明显地反映出一种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人类学化的倾向，我们应当对这种错误倾向进行分析 and 批判，不应当跟着它“乱跑”。

“肯定论”反驳道，“乱跑”说也许不无根据，但在这里并不适用。我们不仅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人类学化的倾向，而且还反对将其人道主义化的倾向。况且，把恩格斯的《起源》看成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奠基作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人类学化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其中可以引出正确的结论，也可以引出错误的结论。的确，马克思进行人类学研究所摘录的相当大一部分资料，有的被引进了《资本论》，有的被引进了《起源》，用来证明他的政治经济学、社会政治学说和唯物主义历史观，这只能说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与其他三个组成部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且，我还发现，《资本论》和《起源》并没有囊括马克思的全部人类学研究，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都相距甚远，这也是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它表明，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取代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反之亦然。众所周知，《资本论》是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同时也是一部历史唯物主义著作，这里只有观察问题的不

同视角，不存在谁取代谁的问题。同样，《起源》是一部历史唯物主义著作，又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著作，当然也不存在谁取代谁的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社会历史观的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组成部分，不能把它与具体的经验科学等同起来，否则，就会导致要么一笔勾消具体科学、要么把历史唯物主义排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的错误，这样的错误我们见得还少吗？至于马克思的人类学研究在客观上是否已经形成一门独立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则不是用几句话而是要用一整本书才能证明的。

“否定论”告诫说，我们迄今见到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且不说它们由于多种主观因素的加入而在形式上变得五光十色，就其实质来看，它们或者已经离开马克思主义，或者根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这种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还需要证明什么？

“肯定论”回答道，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但不能概而论之。关键是它不能成为“否定论”的理由。相反，它却成了“建构论”的现实根据之一。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建构一门独立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尤其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

很明显，通过上述两种观点的争论和撞击，我们选择的天平似乎向“肯定论”方向倾斜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成功地解决所有困难而终于作出了肯定性选择。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接触到正题，更没有触及其中更为深刻的矛盾。

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是什么？它是一门哲学科学还是一门经验科学？如果是前者，它怎样与费尔巴哈的哲学人本学划清界线？如果是后者，它又怎样与摩尔根的进化人类学区别开来？

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对象是什么？人还是社会？史前社会还是整个人类社会？它与社会学和民族学有什么区别？

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方法是什么？历史比较法还是历史与逻辑

辑、一般与个别相统一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理论基础是什么？是人们一般理解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还是马克思、恩格斯自己说的实践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是什么？怎样对待这个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独立研究所作出的一些不同结论？

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 and 作用是什么？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如何对待西方某些人类学家的批评与挑战？

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如何解释马克思、恩格斯之后陆续发现的人类学新资料？

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如何吸取现代人类学研究的新成果？

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如何看待现代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格局和新趋势？

以上十个方面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可以而且应该回答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在科学的基础上得到真正合理的解决，那么，二难选择也就解决了。因此，二难选择将伴随本书所要探讨问题的始终。

二 晚年疑点

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形态和存在方式问题，迄今为止在理论上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

这里首先还不是指，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解释，由于多种主观因素的强制，使它蒙上了色彩斑驳的面纱，从而变得似乎难以辨认了。

这里主要指，即使那些比较客观地对待马克思学说的研究家，也都没有把马克思晚年研究文化人类学时所作的《人类学

笔记》放在应有的位置上。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如果我们把标志着马克思思想发展进程中一个崭新阶段的《人类学笔记》排除在外，如果对它的巨大理论价值尚不能作出客观的科学论证，或者这些笔记对于我们还仅仅是一块尚待开掘的处女地，那么，我们就不能说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已经有了完整的认识和总体的把握。

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一般指的是他在1879—1882年间阅读柯瓦列夫斯基、摩尔根、梅恩、拉伯克和菲尔等人有关文化人类学著作时所作的摘要和批注，一共五个笔记。事实上并不止五个，至少还应该包括阅读毛勒、哈克斯特豪森、莫尼等人同类著作所作的大量笔记。请看以下统计资料：

1868年，马克思开始研究毛勒的《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城市制度和公共政权的历史概论》一书。

1873年，马克思着手考察俄国公社土地占有制的历史，阅读了尼·卡拉乔夫的《古代和当代俄国的劳动组合》以及其他著作和专论。

1876年，马克思又阅读了毛勒的《德国马尔克制度史》、《德国领主庄园制度史》和《德国乡村制度史》。

1876—1878年间，马克思还阅读了哈克斯特豪森的《俄国的土地制度》、乌蒂塞诺维奇的《南方斯拉夫人的家庭公社》、弗·卡尔德纳斯关于西班牙土地所有制历史的著作以及克雷马齐的《印度法和法国法比较》、巴·索柯洛夫斯基的《俄国北部农村公社史概要》等著作。

1879年，马克思仔细研究了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第一册。

1880年，马克思潜心钻研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

1881—1882年间，马克思继续研究文化人类学，又搜集和阅读了大量这方面的著作，其中包括梅恩的《古代法制史讲演录》、

莫尼的《爪哇，怎样管理一个殖民地》、菲尔的《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等等。

这是一份决非完全的统计资料。但仅就这些资料就可以看出，马克思晚年的理论思维从政治经济学研究偏向于文化人类学研究。在1868年直至他生命终结的15年时间里，他对于文化人类学的兴趣越来越浓，这种兴趣在1879—1882年间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一点说明了什么呢？

按照传统的思维逻辑，马克思晚年或许根本不应该进行如此长期而浩繁的人类学研究，因为他这时正面临着三项迫切的现实课题。

第一，他的《资本论》第1卷刚刚在1867年9月问世，紧接着需要完成《资本论》第2、3卷的充实、整理、修订和出版工作。他原打算在1868年春天结束整部作品。但是，他的这个计划最终也没有实现。而仅仅在1867—1870年、1877—1881年期间断断续续地撰写了第2卷的几份手稿。在1870—1877年间他甚至完全中断了第2卷的修订工作。这是否意味着，马克思对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其意义要超过《资本论》第2卷的出版？否则，他何至于在《资本论》整部作品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就转向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

第二，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失败以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无产阶级革命进入了全面退却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向世界人民指明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方法和道路，阐明它将从何处打破资本主义的链条，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这不能不成为作为国际无产阶级之“头脑”的马克思理论研究中一项最迫切的任务。但是，马克思却正是在这时转向了关于古代社会历史的研究。诚然，历史的研究与现实的研究之间必定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但是，从遥远的原始社会研究中能够找到解决眼前资本主义社会现实问题的钥匙吗？我们记得，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初就确定了到时

代的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解剖市民社会的答案的研究原则，几十年来他一直遵循着这一原则。到了晚年，他却改而要到时代的文化人类学中去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答案，这是可以理解的吗？

第三，从1873年开始，爆发了一场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次经济危机表现出来的现象十分特殊，似乎已经超出《资本论》所作的理论概括。马克思说，仔细观察这次危机，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者和职业理论家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他认为，必须注意事件的目前进程，直至它们完全成熟，然后才能对它们进行新的理论概括。可是，马克思在这时却把主要注意力转向了并未发生经济危机的、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俄国、印度、墨西哥和秘鲁等广大地区的农村公社的研究。

从政治经济学研究转向文化人类学研究，从对现实的研究转向对历史的研究，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转向对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这一切显得是那样的矛盾，那样的令人难以理解，然而却是真实的存在。马克思的这种超常思维说明了什么呢？

或许人们会对此作出完全不同的解释。譬如，国外一些学者的见解就是这样。有人说马克思晚年理论思维的能力衰退了，因而不能保持逻辑上的一贯性；有人说马克思在巴黎公社革命失败以后产生了某些失望情绪，他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失去了信心，因而把注意力转向了东方社会；也有人说马克思毕生注重人类学研究，他晚年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是向早期哲学人本学的复归；还有人说马克思晚年力图完善自己的全部理论，如果缺少史前社会理论这一环，他的唯物史观就不能说是完整的历史观。如此等等。

不难看出，所有这些解释都不能令人信服。

所谓“衰退说”，其前提和结论之间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一个思想家的理论观点前后的非一致性，甚至完全相反，可能是由

于思维能力的衰退而引起的逻辑思维的混乱，也可能是对自己以往理论观点的修正，还可能是理论上的突破和创新，等等。这些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都可以随手找出许多例证。既然存在着多种可能性，何以断言必定是“衰退”而不是创新？我们在后面将要证明，马克思晚年理论思维中的矛盾，表面上是超常现象，实际上是正常现象，是完全符合他的思维发展逻辑的；他的思维能力不仅没有衰退，而且达到了历史上的空前高度和一般理论家无可企及的水平。

所谓“失望说”，同样也没有根据。巴黎公社革命以后，整个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走向了低潮，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则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和平发展时期，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危机也没有像马克思预想的那样迅速达到顶点。这一切使马克思认识到了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长期性。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从此失望了，放弃了他在《资本论》中作出的“资本主义的丧钟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这一革命结论。更何况，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关注和研究，并非始于巴黎公社革命以后，早在 50 年代初期就开始了。

所谓“复归说”，也不能成立。马克思早年曾经受到费尔巴哈哲学人本学的影响，但不能说在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哲学人本学阶段。理由很简单，马克思在接受哲学人本学的影响时就已超出哲学人本学，随后又对它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再以后，他再也没有回顾过费尔巴哈。而且，哲学人本学的前提是抽象的人，文化人类学的前提是经验的人，二者有着质的区别，何谈“复归”之有？

所谓“补环说”，仅仅具有部分的道理。马克思在自己的理论活动中总是不断地在补充和完善自己的理论，这是没有疑义的。马克思在对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中创立的原始社会理论丰富和完善了自己的整个理论，这也是事实。但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马克